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李雪峰 高远卓 卢海阳

摘要：返乡农民工是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力量。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相比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长期返乡农民工、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和主动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更强。治理机制分析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强化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的生活依赖提升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的农业生产依赖降低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置更好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能够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 外出务工经历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参与意愿 地方依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提升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效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均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并明确了公众参与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①。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共建共治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鸿沟对城乡居民福利差距的影响研究：效应分解、作用机制及优化路径”（编号：72273108）和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英才工程”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是西南财经大学乡村振兴战略与“三农”问题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但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卢海阳。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0/31/c_1125178024.htm；《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29/c_1126674147.htm。

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①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是村民（秦中春等，2020），强化村民参与是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有效的应有之义。然而，中国农村正面临着“发展悖论”，即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村民参与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相对不高，呈现普遍衰败的景象（王亚华等，2016）。

部分学者关注到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促使城镇向农村人口开放，助推前所未有的流动人口大潮（乔晓春，2019）。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全国人口净流出的行政村数量占全部行政村数量的比重高达79.01%，其中，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行政村数量占比为57.50%（李玉红和王皓，2020）。区别于西方国家以家庭化迁移为主的状况，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盛亦男，2014）。由劳动力外流引发的村民村庄归属感减弱、农村社会资本减弱、农村领导能力下降等问题，被普遍认为是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的重要原因（Wang et al., 2016）。已有实证研究（例如高瑞等，2016；李雪峰和戚军凯，2022）也证实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同于大量实证文献关注劳动力外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针对劳动力回流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农村劳动力从流入地向流出地回流迁移的现象，即农民工“返乡潮”其实一直与劳动力外流现象并行存在，并且自2010年起变得越发明显（张欢和吴方卫，2022）。与劳动力外流带来人力资本流失相比，返乡农民工带着在城市积累的资本、经验、技术等优质资源回到农村，给农村带来“人力资本革命”（厉以宁，2018），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已有研究关注到了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例如，周广肃等（2017）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会帮助返乡农民工积累更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而推动其开展创业活动。罗明忠和雷显凯（2020）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上述研究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对返乡农民工给农村带来“人力资本革命”的研究尚须拓展。尤其是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而言，虽然已有学者建议通过积极引导劳动力返乡以强化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王亚华等，2022），但该观点尚缺相应的实证研究支撑。

鉴于此，本文在农村劳动力回流背景下，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检验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为厘清农民工返乡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提供实证证据；第二，本文对返乡农民工群体进行细分，根据留居意愿将其分为长期返乡农民工和暂时返乡农民工，根据已返乡时长将其分为返乡五年内农民工和返乡五年以上农民工，根据返乡原因将其分为主动返乡农民工和被动返乡农民工，分别进行分析，为全面把握劳动力回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第三，本文从地方依赖视角出发，探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机制，并从村容村貌整治、公共

^①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2/content_5722378.htm。

服务供给、基础设施配套的角度进行异质性检验，丰富对上述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及探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村公共事务是超出个体与家庭范畴、对村民产生影响的事务。因其与社区的共同利益相关，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需要村民在社区层面达成合作治理的共识（王晓毅，2016）。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成效的受益者，村民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实际上是在同一社区内以家庭为基础的众多村民，在政府引导下自主选择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王亚华和臧良震，2020）。从微观层面厘清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集体行动的决策过程和逻辑，对实现社区层面的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蔡起华和朱玉春，2016）。

奥斯特罗姆（2000）提出的自主治理理论，为分析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提供了基本遵循。自主治理理论认为，在任何情景下，理性个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行为策略选择都取决于其行为动机，而行为动机又受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四个内部因素的影响。作为理性个体，村民在进行决策时要权衡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最终选择的往往是预期成本小于预期收益的策略。因此，分析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逻辑，可从分析村民参与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入手。

作为乡村本土人才，返乡农具有有一定的外出务工经历，相比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他们在经济资本、知识技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任远和施闻，2017），能够给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带来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因而，村民收入被认为是影响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因素（彭长生和孟令杰，2007）。收入水平越高，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负担感知越轻，相应的参与意愿越高。增加经济资本积累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加之在外务工过程中通过学习知识技能推动了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条件有助于农民工在返乡后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Vadean and Piracha, 2010），因而，相比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具有更好的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经济基础。同时，返乡农具有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意识，相应的视野眼界更加开阔（夏金梅和孔祥利，2019），并且其经济基础一般优于留守村民，所以返乡农民工更关注和追求美好生活品质。由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返乡农民工从农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更大，因而在主观上更愿意为促进村庄公共事务繁荣发展付出努力（陈澳和赵一夫，2022）。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

H1：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提高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恋，有助于应对集体行动弱化和治理主体缺位等现实困境，已成为当前推动农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Song and Soopramanien, 2019）。地方依赖是地方依恋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产生于人们基于地点满足个体功能性需求的程度而对地点做出的积极性评价（Shumaker and Taylor, 1983）。因此，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赖可看作是村庄对村民功能性需求的满足。根据村民功能性需求的差异，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赖可以划分为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生产依赖，分别对应村庄对村民生活功能性需求和生产功能性需求的满足。已有研究证实，提高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赖，能够显著提升村民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王学婷等，2020）。一方面，对村庄的地方依赖程度较高的村民，

更有动力保护和改善对其自身有意义的地方,从而也更有意愿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Manzo and Perkins, 2006);另一方面,对村庄具有地方依赖的村民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更感兴趣,愿意主动增加与其所在社区的联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Anton and Lawrence, 2014)。

然而,返乡农民工在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生产依赖中存在不同的表现。就村庄生活依赖而言,农民工的返乡决策是在综合权衡个人甚至是家庭得失后做出的(任远和施闻, 2017),而村庄对村民生活功能性需求的满足,正是促成农民工返乡的重要因素。返乡农民工切身感受过城市生活的繁华,但也因为户籍制度与城乡福利制度差异,身在城市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因而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和适应状况可能并不比在农村更好(邓睿等, 2016)。相比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能体会城市生活的“遥不可及”和农村生活的“弥足珍贵”,进而提高其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就村庄生产依赖而言,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乐业”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实现“安居”的前提条件(李卓等, 2021)。返乡农民工在外务工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使其在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加之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多数农民工在返乡后会从事非农生产经营(贺小丹等, 2021)。同时,外出务工经历也被证实对返乡农民工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李敏等, 2020)。返乡农民工倾向于选择从事非农生产经营以获取维持生计的收入,说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提升返乡农民工对村庄非农生产的依赖程度,并相应地降低其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

综上所述,外出务工经历会提升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生活依赖和非农生产依赖,但会降低返乡农民工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而以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生产依赖为代表的地方依赖,又能直接促进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 地方依赖能够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中介作用。

H2a: 村庄生活依赖能够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中介作用。

H2b: 村庄生产依赖能够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一)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简称 CLDS)。该调查覆盖中国 29 个省份(除港澳台地区、西藏、海南外),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中年龄为 15~64 岁的劳动力,调查采取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其中,本文所使用的 2018 年调查数据共涉及样本 16537 个劳动力个体、13501 个受访家庭以及 368 个社区。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因素不仅来自个体层面,也来自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因而,本文根据样本编号将个体问卷、家庭问卷以及村居问卷进行匹配合并。本文研究的是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并且问卷中相关题项也仅在农村社区开展了数据收集,因而,剔除了在城市社区收集的个体样本数据,以及在农村社区但为城市户籍的个体样本数据。在对数据进行上述处理并删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本文最终获得 7470 个研究样本。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是指同一村庄的村民在面对具有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时的决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村民是否有参与意愿；二是具有参与意愿的村民选择的参与方式，这决定了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程度（蔡起华和朱玉春，2015）。相比于后者，村民具有参与意愿才是村民达成合作治理的前提，这在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承认（例如史雨星等，2018），因而本文使用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道路修建是典型的农村公共事务，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假如村里组织修路，需要劳力或资金，你是否愿意参加或捐款”，构建有序分类变量“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并将“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看情况”“比较愿意”“非常愿意”依次赋值为1、2、3、4、5。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得分越高，说明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越强，越有助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目标达成。

2.自变量：外出务工经历。在本文中，返乡农民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后，因各种原因又重新返回户籍所在地的农村户籍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被界定为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①。这意味着，外出可被界定为离开户籍所在乡镇地域6个月及以上。因此，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请问您是否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构建二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若受访者回答为“是”，外出务工经历变量赋值为1；反之，外出务工经历变量赋值为0。本文所用村民样本均为受访当期在农村社区居住的农村户籍劳动力，若受访者具有外出务工经历，本文直接将其判定为返乡农民工；若受访者没有外出务工经历，本文将其判定为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

3.作用机制变量：地方依赖。本文还将讨论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机制。地方依赖是指个体所在社区对其功能性需求的满足，在本文中被分为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生产依赖。就村庄生活依赖而言，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我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生活”，来测量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将“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非常不赞同”依次赋值为1、2、3、4、5。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得分越高，说明村庄对受访者生活功能性需求的满足越好，受访者对村庄生活的依赖程度越高。就村庄生产依赖而言，受限于数据来源，本文仅重点考察村庄农业生产依赖。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农业生产对你家来说越来越不重要”，对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进行衡量，将“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非常不赞同”依次赋值为1、2、3、4、5。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得分越高，说明村庄对受访者农业生产功能性需求的满足越好。

4.控制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如高瑞等，2016；李荣彬，2021），设置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村民的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健康状况、党员身份、婚姻状态、受教育年限、基本医疗保险情况和人情往来情况；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承包耕地面积和农业生产情况；社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社区人均收入、集体经济收入、非农经济发展情况、宗族网络情况、距县城距离、所在地区地形状况（分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地地区）。

^①资料来源：《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9/content_5688043.htm。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总样本	返乡农民工	留守村民	总样本
		均值	样本均值	样本均值	标准差
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	“假如村里组织修路，需要劳力或资金，你是否愿意参加或捐款”：非常愿意=5，比较愿意=4，看情况=3，不太愿意=2，非常不愿意=1	4.122	4.207	4.099	0.808
外出务工经历	受访者是否有外出（跨县流动半年以上）务工经历：是=1，否=0	0.214	1.000	0.000	0.410
村庄生活依赖程度	“我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生活”：非常不赞同=5，不太赞同=4，一般=3，比较赞同=2，非常赞同=1	3.865	3.906	3.853	0.923
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	“农业生产对你家来说越来越不重要”：非常不赞同=5，不太赞同=4，一般=3，比较赞同=2，非常赞同=1	3.451	3.341	3.481	1.087
性别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0.516	0.641	0.482	0.500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50.720	45.080	52.257	12.523
健康状态	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非常健康=5，健康=4，一般=3，比较不健康=2，非常不健康=1	3.489	3.494	3.487	1.032
党员身份	受访者是否为党员：是=1，否=0	0.044	0.036	0.047	0.206
婚姻状态	受访者是否为已婚：是=1，否=0	0.898	0.871	0.905	0.303
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年）	7.031	8.121	6.734	3.795
基本医疗保险情况	受访者是否有医疗保险：是=1，否=0	0.943	0.945	0.942	0.232
人情往来情况	受访者是否会在村里其他人办喜事时送礼：全部都去=4，大部分会去=3，少部分会去=2，极少会去=1	2.399	2.366	2.408	1.087
家庭年收入	受访者家庭年度总收入（万元），取对数	4.880	5.117	4.802	5.968
承包耕地面积	受访者家庭承包的耕地面积（亩）	7.291	6.783	7.430	10.212
农业生产情况	受访者家庭是否在去年从事农业生产：是=1，否=0	0.699	0.680	0.704	0.459
社区人均收入	受访者所在社区的人均收入（万元），取对数	2.921	2.930	2.918	2.727
集体经济收入	受访者所在社区的集体经济收入（万元），取对数	53.052	35.366	58.849	246.475
非农经济发展情况	受访者所在社区是否有非农经济发展：是=1，否=0	0.237	0.213	0.243	0.425
宗族网络情况	受访者所在社区的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	44.273	46.354	43.706	25.794
距县城距离	受访者所在社区距最近县城或区政府的距离（千米）	26.269	29.362	25.425	21.697
平原地区	受访者所在社区的地势是否为平原：是=1，否=0	0.492	0.399	0.517	0.500
丘陵地区	受访者所在社区的地势是否为丘陵：是=1，否=0	0.265	0.329	0.248	0.441
山地地区	受访者所在社区的地势是否为山地：是=1，否=0	0.243	0.272	0.235	0.429

注：①非农经济对应的产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茶叶加工业、酿酒业、饮料制造业、草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采矿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纺织业、造纸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物业出租、旅游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②家庭年收入、社区人均收入和集体经济收入在表中描述的是原始值的均值和标准差。

(三) 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非参数卡方检验，对比返乡农民工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方面的差异（对比结果如表 2 所示）。返乡农民工与留守村民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均较高，前者回答为“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的比例为 86.313%，后者为 83.374%。由此可知，村民对以村庄道路修建为代表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普遍持积极态度。卡方检验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显著高于留守村民，差异主要体现为返乡农民工中非常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比例更高。

表 2 返乡农民工样本和留守村民样本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差异分析

		返乡农民工		留守村民	
		频数	占比 (%)	频数	占比 (%)
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	非常不愿意	7	0.437	32	0.545
	不太愿意	58	3.625	267	4.548
	看情况	154	9.625	677	11.533
	比较愿意	759	47.438	3007	51.227
	非常愿意	622	38.875	1887	32.147
卡方检验		$\chi^2(4) = 27.387$			

(四) 模型设置

为检验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本文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Participation_i = \alpha_i + \beta_i Returning_i + \delta_i Control_i + \varepsilon_i \quad (1)$$

(1) 式中：下标 i 代表样本村民编号； $Participation_i$ 是本文关注的因变量，表示村民 i 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自变量 $Returning_i$ 表示村民 i 的外出务工经历； $Control_i$ 是一系列影响村民 i 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个体层面、家庭层面以及社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α_i 为常数项， ε_i 是随机扰动项， β_i 和 δ_i 为待估参数。由于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本文使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方程 1 为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方程 2 和方程 3 作为对照，调整了模型设定形式及估计方法，分别为使用有序 Logit 模型和 OLS 回归得到的结果。在所有的回归结果中，外出务工经历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研究假说 H1 得到验证。这也说明，农民工“返乡潮”在微观层面确实有助于推动以村庄道路修建为代表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此外，年龄、健康状态、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人情往来情况、家庭年收入、农业生产情况、非农经济发展情况和距县城距离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婚姻状态、基本医疗保险情况、承包耕地面积、

社区人均收入和宗族网络情况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值得关注的是，返乡农民工年龄对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呈“倒U型”。

表3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有序 Probit 模型		有序 Logit 模型		OLS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外出务工经历	0.163***	0.035	0.298***	0.060	0.107***	0.024
性别	-0.012	0.025	-0.012	0.043	-0.015	0.018
年龄	0.019***	0.007	0.034***	0.012	0.015***	0.005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健康状态	0.054***	0.015	0.093***	0.027	0.038***	0.011
党员身份	0.324***	0.069	0.547***	0.114	0.206***	0.043
婚姻状态	0.047	0.047	0.075	0.081	0.040	0.034
受教育年限	0.012***	0.004	0.018**	0.007	0.009***	0.003
基本医疗保险情况	0.053	0.057	0.097	0.103	0.047	0.042
人情往来情况	0.144***	0.014	0.250***	0.024	0.099***	0.010
家庭年收入	0.022***	0.007	0.041***	0.013	0.015***	0.005
承包耕地面积	0.001	0.002	0.002	0.003	0.001	0.001
农业生产情况	0.168***	0.033	0.298***	0.059	0.119***	0.024
社区人均收入	-0.003	0.026	-0.013	0.045	0.001	0.019
集体经济收入	-0.042***	0.008	-0.074***	0.014	-0.028***	0.006
非农经济发展情况	0.106***	0.038	0.214***	0.065	0.057**	0.027
宗族网络情况	0.001	0.001	0.002*	0.001	0.000	0.000
距县城距离	0.002***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平原地区	-0.117***	0.045	-0.242***	0.078	-0.064**	0.032
丘陵地区	-0.114**	0.045	-0.239***	0.076	-0.061**	0.031
观测值	7470		7470		7470	

注：①***、**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的对照组为山地地区。

有序 Probit 模型和有序 Logit 模型的回归系数没有实际意义，只能反映显著性与符号方向。为反映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实际效应，本文计算了外出务工经历在均值处的边际效应，结果如表 4 所示。根据表 4 中有序 Probit 模型的计算结果，外出务工经历使村民选择“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看情况”“比较愿意”的概率分别降低 0.3%、1.4%、2.2%和 1.9%，而选择“非常愿意”的概率要增加 5.8%。这进一步表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有效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即返乡农民工更有意愿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有序 Logit 模型的计算结果类似，在此不再累述。可见，随着“返乡潮”的出现，很多农民工返回家乡，这不仅能够为农村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也能够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支持。

表 4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边际效应分析

模型	非常不愿意	不太愿意	看情况	比较愿意	非常愿意
有序 Probit 模型	-0.003***	-0.014***	-0.022***	-0.019***	0.058***
有序 Logit 模型	-0.002***	-0.012***	-0.025***	-0.025***	0.063***

注：***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二) 内生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上述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排除可能存在的模型设定偏差、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简称 PSM）重新进行回归。本文通过 Logit 模型测算受访者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概率，并根据测算出的倾向值得分分别使用最近邻匹配（k=2）、半径匹配（卡尺半径为 0.02）和核匹配（使用默认的核函数及带宽）对实验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进行匹配，确保匹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经过样本匹配后，三种匹配结果均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与共同支撑假设检验^①。PSM 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根据表 5，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平均处理效应由 0.108 分别变为 0.088、0.102 和 0.102，且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

表 5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PSM 估计

匹配方法	实验组	对照组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t 值
匹配前	4.207	4.099	0.108***	0.023	4.747
最近邻匹配	4.207	4.119	0.088***	0.033	2.698
半径匹配	4.207	4.105	0.102***	0.024	4.191
核匹配	4.207	4.105	0.102***	0.024	4.183

注：***表示 1%的显著性水平。

为避免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问题，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重新进行回归。借鉴徐超等（2017）的研究，本文选择外出务工氛围作为外出务工经历的工具变量，利用本社区除受访者本人外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数占本社区户籍人口数的比重衡量外出务工氛围。该工具变量同时满足与关键自变量相关但与模型误差项无关两个条件。一方面，社会网络在个人迁移决策中具有关键作用。在一个有外出务工传统的社群中，工作信息更易得到传播，外出务工的信息搜寻成本相对低，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外出务工决策（徐慧等，2019），因而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个体很难影响到整个社区其他村民的外出务工行为，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由于作为因变量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为有序分类变量，本文采用条件混合过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简称 CMP）方法进行处理。表 6 展示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 CMP 估计结果。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氛围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同时，内生性检验参数 atanrho_12 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不为 0，说明基准回

^①限于篇幅，未展示全部结果。

归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就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而言，外出务工经历对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这一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表 6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外出务工经历		0.420*** (0.080)
外出务工氛围	3.752*** (0.13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atanrho_12		-0.174*** (0.050)
观测值		7470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的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3。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改因变量测度、重新筛选样本、调整聚类层次和转变研究场景等。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7。

第一，更改因变量测度。本文将用二元变量替代分类变量，测度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若回答为“比较愿意”“非常愿意”，则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二元变量赋值为 1；若回答为其他选项，则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二元变量赋值为 0。表 7 方程 1 展示了更换因变量测量后的回归结果，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为正，并且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证明前述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第二，重新筛选样本。考虑到直辖市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占比较低，相应的返乡农民工占比也较低，为避免样本偏误对实证结果造成干扰，本文剔除位于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和重庆市的个体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7 方程 2 所示，外出务工经历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与前述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第三，调整聚类层次。农村社区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熟人社会，不同村民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可能彼此相关，他们可能面临一些共同的干扰因素。本文假设同一农村社区内部的干扰项相互关联，不同农村社区的干扰项不存在相关性，并在基准回归模型基础上将聚类调整为社区层次。根据表 7 方程 3，在重新调整聚类层次后，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大小变化不大，并且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第四，转变研究场景。由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涵盖农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进一步确保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本文将研究场景转变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典型的农村公共事务（李雪峰和戚军凯，202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明确指出，

要“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①。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遇到有人随地吐痰或践踏绿地花木，是否会采取行动”和“遇到有人将垃圾乱堆乱放，是否会采取行动”，分别构建变量“践踏制止意愿”和“乱堆制止意愿”。若回答为“当面制止”或“向有关部门反映”，则“践踏制止意愿”和“乱堆制止意愿”变量赋值为1；若回答为“没有行动”，则两个变量均赋值为0。本部分利用 Probit 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根据表7 方程4 和方程5，外出务工经历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一公共事务治理研究场景中，外出务工经历仍对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7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方程1 更改因变量测度	方程2 重新筛选样本	方程3 调整聚类层次	方程4 践踏制止意愿	方程5 乱堆制止意愿
外出务工经历	0.128*** (0.047)	0.163*** (0.036)	0.163*** (0.043)	0.142** (0.065)	0.140** (0.06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7470	7190	7470	2777	2611

注：①***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②除方程3 括号内为聚类到社区的标准误外，其他方程均为聚类到家庭的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3。

五、进一步分析

（一）基于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的影响效应再估计

本文根据返乡农民工的留居意愿、已返乡时间和返乡原因，对基于外出务工经历识别的返乡农民工进行分类，以期更深入地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差异。

首先，不同返乡农民工可能有不同的生活工作计划，部分返乡农民工可能选择回流到农村长期居住，部分返乡农民工可能选择继续外出务工，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个体问卷中的题项“请问您是否还准备外出务工”，在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样本中，将不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样本定义为长期返乡农民工，将还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样本定义为暂时返乡农民工，并分别构建二元变量“长期返乡”和“暂时返乡”。若农民工不准备再外出务工，则长期返乡变量赋值为1；否则，长期返乡变量赋值为0。若农民工准备再外出务工，则暂时返乡变量赋值为1，否则，暂时返乡变量赋值为0。本文以长期返乡和暂时返乡替换（1）式中的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8 方程1 所示。根据方程1 估计结果，虽然长期返乡和暂时返乡的系数均为正，但仅长期返乡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只有具有留居意愿的长期返乡农民工才具有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而暂时返乡农民工并不能有效促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①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http://www.gov.cn/zhengce/2021-12/05/content_5655984.htm。

其次，农民工“返乡潮”一直与“外出务工潮”并行存在，部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可能已返乡多年，部分可能才返乡不久。具有不同返乡时长的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个体问卷中的题项“请问您最近一次跨县外出是什么时候返回家乡的”，分别构建二元变量“返乡五年内”和“返乡五年以上”。其中：若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最近一次跨县外出时间距调研时点（2018年）5年之内，返乡五年内变量赋值为1；否则，返乡五年内变量赋值为0。若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最近一次跨县外出时间距调研时点（2018年）已逾5年，返乡五年以上变量赋值为1；否则，返乡五年以上变量赋值为0。本文使用返乡五年内和返乡五年以上变量替换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后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8方程2所示。结果显示，仅返乡五年以上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返乡五年内变量并不显著。以上分析表明，已返乡时长逾五年的返乡农具有明显较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而已返乡时长在五年内的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最后，不同农民工做出返乡决策的原因各有差异，部分返乡农民工可能是主动返乡，部分返乡农民工可能是被迫返乡。已有研究就农民工的返乡原因展开过有益的探讨。有学者提出，劳动力外出的目的是增加必要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便他们在返乡后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因而外出劳动力在完成既定目的后会选择主动返乡（Constant and Massey, 2002）。但也有学者提出，只有“失败者”才会选择返乡，他们是因年迈、生病等原因而被“淘汰”出城市，或是在城市没有找到与预期相匹配的工作而被迫返乡（Borjas and Bratsberg, 1996）。那么，主动返乡和被迫返乡的农民工，在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呢？本文根据个体问卷中的题项“您打算长期待在家乡的原因是什么”，进一步对长期返乡农民工进行分类，将回答是“为了照顾家人”“回家乡也能获得较好的收入”“习惯了本地生活，不习惯外地生活”的样本认定为主动返乡，将回答为“在外找不到好工作”“生病，受伤等身体因素限制”的样本认定为被动返乡，并分别构建二元变量“主动返乡”和“被动返乡”。本文使用主动返乡和被动返乡变量替换外出务工经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8方程3所示。根据回归结果，主动返乡和被动返乡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为正；就系数大小而言，主动返乡农民工比被动返乡农具有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可能的原因是：被动返乡农民工在主观上仍倾向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做出返乡决策更多的是现实约束下的无奈之举，对村庄的地方依赖程度较低，因而他们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自觉性不如主动返乡农民工（陈澳和赵一夫，2022）。

表8 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回归结果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对照组：未外出的留守村民	长期返乡	0.184***	0.038				
	暂时返乡	0.087	0.067				
对照组：未外出的留守村民	返乡五年内			0.059	0.050		
	返乡五年以上			0.235***	0.043		

表 8 (续)

对照组：未外出的留守村民与暂时返乡农民工	主动返乡			0.205***	0.046
	被动返乡			0.129**	0.05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7470	7470	7470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表中的标准误为聚类到家庭的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3。

(二) 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地方依赖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外出务工经历又可能对不同维度的地方依赖，即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农业生产依赖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江艇（202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建议，由于地方依赖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已得到其他学者证实（例如 Anton and Lawrence, 2014；王学婷等，2020），本文将着重探讨核心自变量对作用机制变量的影响。

就村庄生活依赖而言，根据表 9 方程 1 的估计结果，外出务工经历对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存在正向影响，且变量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相比于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依赖程度更高。外出务工虽然能够给村民带来更高的收入，但由于社会融入难、生活成本高等原因，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和适应状况可能并不比在农村好（邓睿等，2016），因而，返乡后他们反而具有较高的村庄生活依赖程度，不再对城市生活抱有过高的期待。根据表 9 方程 5 的估计结果，外出务工经历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这表明，返乡农民工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较之留守村民更低。这是由于外出务工经历帮助返乡农民工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扩展了他们的就业选择范畴，因而，相比于从事比较收益较低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投身非农产业更有助于发挥返乡农民工的比较优势。综上所述，研究假说 H2a 和研究假说 H2b 得到证实。

为进一步解释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差异，本文运用上文的返乡农民工划分类别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首先，长期返乡对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暂时返乡对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和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均具有负向效应，且对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影响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暂时返乡的农民工只是将返乡作为循环迁移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环节，在未来的某一时间点还会离开村庄外出务工，主动寻求生活和工作场域的转变，因而，相比于留守村民，暂时返乡的农民工对当期村庄生活和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更低。长期返乡的农民工计划长期生活在村庄，因而表现出更强的村庄生活依赖。同时，由于具有更大的就业选择范畴和非农就业比较优势，他们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相比留守村民更低，但比暂时返乡的农民工高。

其次，返乡五年内仅对返乡农民工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返乡五年以上不仅对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对他们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多数农民工返乡后更倾向于选择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贺小丹，2021），因而，不论农民工已返乡时长是否超过五年，返乡农民工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均显著低于留守村民。然

而，在村庄生活依赖方面，已返乡时长不同会导致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依赖程度出现差异。由于距离远、互动频率较低、地缘关系受到破坏等原因，大量农民工成为乡村社会的“缺席者”（江立华和卢飞，2015）。农民工在返乡之后，也需要一定的时间重新嵌入乡村生活。因此，已返乡时长较长的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适应和依赖程度会更高。

最后，主动返乡和被动返乡均对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仅有被动返乡对返乡农民工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有不同返乡原因的农民工而言，村庄是他们在返乡后一定时期内日常生活的主要场域，因而农民工均会表现出较高的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就村庄农业生产依赖而言，主动返乡是农民工在充分收集信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做出的返乡决策。虽然外出务工经历使主动返乡农民工在非农生产经营方面积累了一定优势，但在国家涉农政策的激励和引导下，仍有大量农民工主动返乡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因此，主动返乡对农民工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被动返乡农民工的返乡原因包括“在外找不到好工作”和“生病，受伤等身体因素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从事比较收益低、劳动投入大的农业生产的主观意愿或客观能力，因而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更低。

综上所述，从地方依赖视角看，虽然外出务工经历影响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但对所有类型的返乡农民工而言，以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农业生产依赖为代表的地方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理解返乡农民工为什么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支撑。随着乡村建设行动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将得到持续改善，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依赖也将得到巩固。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返乡创业就业红利将得到逐渐释放。这有助于改善返乡农民工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因而，有理由相信，返乡农民工将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重要助力。

表9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检验

变量	村庄生活依赖程度				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方程8
外出务工经历	0.093*** (0.033)				-0.135*** (0.033)			
长期返乡		0.145*** (0.036)				-0.089** (0.036)		
暂时返乡		-0.099 (0.062)				-0.304*** (0.060)		
返乡五年内			-0.004 (0.047)				-0.122** (0.048)	
返乡五年后			0.159*** (0.040)				-0.143*** (0.041)	
主动返乡				0.185*** (0.043)				-0.003 (0.042)

表9 (续)

被动返乡				0.102*				-0.162***
				(0.055)				(0.06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7470	7470	7470	7470	7470	7470	7470	7470

注：①***、**、*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的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3。

(三) 异质性分析

前文验证了村庄生活依赖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加深对外出务工经历与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之间关系的认识，本部分沿着村庄生活依赖这一理论机制，以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套为依据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在不同宜居水平的村庄中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异质性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根据社区问卷中的题项“社区容貌的整洁程度”，将评分为9~10的社区认定为村容村貌整治较好的村庄，将评分低于9分的社区认定为村容村貌整治一般的村庄；根据社区问卷中的题项“本村有没有卫生室或卫生站”，将有卫生室或卫生站的村庄认定为公共服务供给较好的村庄，将没有卫生室或卫生站的村庄认定为公共服务供给一般的村庄；根据社区问卷中的题项“本村的交通道路有没有路灯”，将有路灯的村庄认定为基础设施配套较好的村庄，将没有路灯的村庄认定为基础设施配套一般的村庄。本部分根据这三个分类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进行分组回归。

根据表10方程1和方程2的估计结果，不论是在村容村貌整治较好还是一般的村庄，外出务工经历均会对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进一步比较两个分组的外出务工经历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别，本文使用Stata 17.0软件中的**bdiff**命令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发现两组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因而可认为在村容村貌整治较好的村庄居住的返乡农民工有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类似地，根据表10方程3和方程4、方程5和方程6的估计结果，虽然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均为正，但外出务工经历仅在公共服务供给较好的村庄以及基础设施配置较好的村庄分组中显著。这表明，较好的村庄宜居条件更能激发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积极效应，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套较好的村庄。根据表8的估计结果，村庄生活依赖是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机制，而改善村庄宜居条件是提高返乡农民工村庄生活依赖程度的关键。因此，要切实激发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应持续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建设行动。

表10 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影响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方程1 村容村貌整治 较好的村庄	方程2 村容村貌整治 一般的村庄	方程3 公共服务供给 较好的村庄	方程4 公共服务供给 一般的村庄	方程5 基础设施配套 较好的村庄	方程6 基础设施配套 一般的村庄
外出务工经历	0.226*** (0.080)	0.146*** (0.040)	0.169*** (0.038)	0.078 (0.096)	0.240*** (0.053)	0.072 (0.048)

表 10 (续)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	1948	5522	6400	994	3604	3866

注：①***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的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3。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与外流现象长期并行存在。农民工回流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文利用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表明农民工返乡确实有助于促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第二，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异质性影响。从留居意愿来看，长期返乡的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而有外出务工计划的暂时返乡的农民工并未表现出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从已返乡时长来看，返乡五年以上的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而返乡五年内的农民工没有体现出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从返乡动机来看，不论是主动返乡还是被动返乡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均会促进他们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但前者所发挥的积极效应更强。第三，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提高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依赖程度提升他们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对他们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的返乡农民工而言，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农业生产依赖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其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中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第四，外出务工经历对居住在不同类型村庄的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异质性影响，即居住在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配套更好的村庄的返乡农具有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引导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力军与带头人。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城乡双向流动，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强化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人力资源建设。在返乡农民工中主动发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带头人，吸纳工作作风实、综合能力强的中青年群体进入村“两委”班子，让他们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承担更多的组织领导职责，加快重塑乡村治理权力结构与秩序。第二，以人为本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更好地满足返乡农民工的生活功能性需求。推进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行动，通过不断提高村庄的宜居水平，确保返乡农民工有动力、有意愿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特别地，政府应将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为乡村建设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乡村建设目标是解决村民需求，并根据村民需求偏好排序安排乡村建设项目的建设顺序，完善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机制，把村庄对村民生活功能性需求的满足作为乡村建设项目绩效考核的重点。第三，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返乡农民工“想回来”“有发展”。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尤其是推动农民工主动返乡和长期返乡，离不开乡村产业的发展壮大。一方面，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

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以乡村休闲旅游为重点拓展农业多功能性，既要依托龙头企业创造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也要引导返乡农民工合理开展创业；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等途径，加快探索返乡农民工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实践路径，引导返乡农民工成为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 奥斯特罗姆, 2000: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余逊达、陈旭东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第40-47页。
2. 秦中春, 2020: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管理世界》第2期, 第1-6页、第16页、第213页。
3. 蔡起华、朱玉春, 2015: 《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57-69页。
4. 蔡起华、朱玉春, 2016: 《社会资本、收入差距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三省区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维护为例》, 《公共管理学报》第4期, 第89-100页、第157页。
5. 陈澳、赵一夫, 2022: 《返乡群体参与乡村治理意愿研究——基于村庄资源禀赋认知和个体资本差异分析》, 《重庆社会科学》第10期, 第69-82页。
6. 邓睿、冉光和、肖云、刘迎君, 2016: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 第58-69页、第112页。
7. 高瑞、王亚华、陈春良, 2016: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2期, 第84-92页。
8. 贺小丹、董敏凯、周亚虹, 2021: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与农村资源配置——基于农民工返乡后行为的微观分析》, 《财经研究》第2期, 第19-33页。
9. 江立华、卢飞, 2015: 《农民工返乡消费与乡村社会关系再嵌入》, 《学术研究》第3期, 第40-46页、第159页。
10. 江艇, 2022: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 第100-120页。
11. 李敏、廖琳、周雨恩、黄晓慧, 2020: 《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第97-103页。
12. 李荣彬, 2021: 《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治理之道——来自宗族网络的证据与解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第129-138页。
13. 李雪峰、戚军凯, 2022: 《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第45-55页。
14. 李玉红、王皓, 2020: 《中国人口空心村与实心村空间分布——来自第三次农业普查行政村抽样的证据》, 《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第124-144页。
15. 李卓、张森、李轶星、郭占锋, 2021: 《“乐业”与“安居”: 乡村人才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陕西省元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第56-68页。
16. 厉以宁, 2018: 《农民工、新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革命》, 《改革》第6期, 第5-12页。

- 17.罗明忠、雷显凯, 2020: 《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第29-38页、第170页。
- 18.彭长生、孟令杰, 2007: 《农村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因素: 基于集体行动的视角——以安徽省“村村通”工程为例》,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1-6页。
- 19.乔晓春, 2019: 《户籍制度、城镇化与中国人口大流动》, 《人口与经济》第5期, 第1-17页。
- 20.任远、施闻, 2017: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人口研究》第2期, 第71-83页。
- 21.盛亦男, 2014: 《中国的家庭化迁居模式》, 《人口研究》第3期, 第41-54页。
- 22.史雨星、姚杨柳、赵敏娟, 2018: 《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 Triple-Hurdle 模型的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第3期, 第35-50页。
- 23.王晓毅, 2016: 《乡村公共事务和乡村治理》,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第54-60页。
- 24.王学婷、张俊飏、童庆蒙, 2020: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4期, 第136-148页。
- 25.王亚华、高瑞、孟庆国, 2016: 《中国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危机与响应》,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第23-29页、第195页。
- 26.王亚华、苏毅清、舒全峰, 2022: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173-187页、第219页。
- 27.王亚华、臧良震, 2020: 《小农户的集体行动逻辑》, 《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 第59-67页。
- 28.夏金梅、孔祥利, 2019: 《“城归”现象: 价值定位、实践基础及引导趋向》, 《经济学家》第12期, 第58-67页。
- 29.徐超、吴玲萍、孙文平, 2017: 《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 CHIPS 数据的证据》, 《财经研究》第12期, 第30-44页。
- 30.徐慧、梁捷、赖德胜, 2019: 《返乡农民工幸福度研究——外出务工经历的潜在影响》, 《财经研究》第3期, 第20-33页。
- 31.张欢、吴方卫, 2022: 《产业区域转移背景下就业机会与收支剩余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6期, 第107-128页。
- 32.周广肃、谭华清、李力行, 2017: 《外出务工经历有益于返乡农民工创业吗?》, 《经济学(季刊)》第2期, 第793-814页。
33. Anton, C. E., and C. Lawrence, 2014,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The Effect of Place of Residence on Place Attachmen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0(4): 451-461.
34. Borjas, G. J., and B. Bratsberg, 1996, "Who Leaves? The Outmigration of the Foreign-Bor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1): 165-176.
35. Constant, A., and D. S. Massey, 2002, "Return Migration by German Guestworkers: Neoclassical Versus New Economic Theo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4): 5-38.
36. Manzo, L. C., and D. D. Perkins, 2006, "Finding Common Ground: The Importance of Place Attachment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lanning",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 20(4): 335-350.

37. Shumaker, S. A., and R. B. Taylor, 1983, "Toward a Clarification of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s: A Model of Attachment to Place", in N. R. Feimer, and E. S. Geller, (ed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Direction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aeger, PP. 219-251.

38. Song, Z., and D. Soopramanien, 2019, "Types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Cities*, 84(1): 112-120.

39. Vadean, F., and M. Piracha, 2010, "Circular Migration or Permanent Return: What Determines Different Forms of Migration", in G. S. Epstein, and I. N. Gang, (eds.) *Migration and Culture*,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Bingley, PP. 467-495.

40. Wang, Y., C. Chen, and E. Araral, 2016,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mmons: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88(12): 79-93.

(作者单位: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

(责任编辑: 光明)

The Impact of Outworking Experiences on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Public Affairs

LI Xuefeng GAO Yuanzhuo LU Haiyang

Abstract: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 are an important force contributing to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Considering road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public governanc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outworking experiences on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gover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tworking experienc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ural public governance, indicating that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public governance than villagers who never go outside the village. Migrant workers who stay home for a long term, have been back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and volunteer to return home have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public governance. The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outworking experiences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governance by strengthening their dependence on village life, but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willingness by weakening their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inds that in villages with better appearance, mor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nd better infrastructure support, the outworking experiences further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governance.

Keywords: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Outworking experience; Rural public governanc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Local dependence